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孙伯鍤集

# 历史、实践与社会

LISHI SHIJIAN YU SHEHUI

SUNBOKUI

孙伯鍤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孙伯鍤集

# 历史、实践与社会

SHI SHIJIAN YU SHEHUI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图书馆

总号

书号

B0-0  
258

1-2

孙伯鍤 著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图书馆 0295138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实践与社会. 孙伯鍈集/孙伯鍈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ISBN 978-7-214-09269-4

I. ①历… II. ①孙…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364 号

书 名 历史、实践与社会·孙伯鍈集

---

著 者 孙伯鍈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鲁从阳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2.625 插页 1

字 数 334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269-4

定 价 34.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孙伯鍈教授哲学思想访谈录(代序)

胡大平

孙伯鍈教授,1930年6月生于江苏泰兴。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后服从党组织派遣参加华东团校第五期学习,结业后留华东团工委机关工作。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毕业后任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师,1959年改任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教师,1975年调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自1959年起,先后参加十余种哲学教材的编写,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卢卡奇与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孙伯鍈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国家社科规划委员会哲学组成员。

孙伯鍈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建树,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研究模式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他倡导的“回归(到)马克思”正成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底蕴。

## 一、学术简历

**问(笔者,下同):**孙先生,从您的简历看,您大学期间学习的并不是哲学,那您是如何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呢?

**答(孙伯鍈,下同):**说起我怎样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并不纯粹是偶然的,虽说我学的专业是历史而不是哲学,但我对哲学的爱好与向往却由来已久。1945年夏,偶然间曾读到一本从未见过的书:《辩证唯物论》,匆匆翻了两天,当时虽不甚了了,但颇感新奇。1949年解放,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理论书籍。这一年我似懂非懂地阅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1950年6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组织派送入华东团校学习,修完了包括《联共布党史》在内的一批理论课程。团校结业后,我被留在华东团工委机关工作。工作之余,又反复阅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读完了《资本论》第1卷,并做了详细摘要,此外还有《毛泽东选集》第1、2、3卷,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著作。1954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放弃对哲学理论的眷恋,而是想增进对历史知识的了解,扩展哲学思考的知识基础。不过以上这些都仅仅是最初的摸索和兴趣培养,还远远没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了解。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呢?

**答:**在大学四年我没有修过哲学课程,但由于形势需要却又不得不很快登上哲学讲台。经过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之后,1959年上半年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我经教研室指派担任原子能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哲学课程,内容分三部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后两个部分的教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所幸的是,一学期下来,我不仅没有被学生轰下台来,而且还颇受好评。这一讲就是40多年,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讲台。

**问:**在您 40 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您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并成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

**答:**请别把我看成什么哲学家,我最多只能算是个好学的学生。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整整 20 年的时间,这中间除了教学和政治运动之外,可以说,没有什么独立的理论研究。20 年中,我总共发表了五六篇论文,其中有的还受到了清理和批判。不过在这个时期内我还是利用了北京大学优越的学习环境,不失时机地听了国内许多著名哲学家开设的课程,其中有冯定、艾思奇等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贺麟、郑昕、任华等开设的西方哲学课程,以及张岱年、任继愈等开设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专题讲座。在教学之余,我自学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和中、西方哲学家的经典名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原著一再反复地阅读与思考,在哲学和相关理论以及历史知识的积累和融会贯通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这些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开展理论与教学实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从 1981 年到 2001 年又经过了整整 20 年,在这 20 年中我编写和出版的哲学著作与学术论文总数超过 300 万字,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得到了学界同仁、学生和读者们的赞许与首肯,这些就算是我以一生的心力对党和人民所作的一点微薄的回报吧。

**问:**在您的著述中,您一直强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史,从而厘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您开始是怎样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的?

**答:**1962 年起,我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了备课我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 1—8 卷的全部内容,以及当时刚刚翻译出版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重读了《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恩格斯晚年的哲学著作和书信等,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讲稿、摘要和笔记。1964 年秋天,由于突然开展的政治运动(北大“社教”与接踵而至的农村“四清”和“文革”),课程中断,这项研究工作也暂告中止。“文革”后

期(1975年),我调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后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开始筹划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经过努力,1978年终于开出了100多课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一直讲到毛泽东思想,其中我承担马克思阶段的讲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至1979年秋我完成了全部马克思恩格斯部分的哲学史讲稿,共约40余万字。1981年,我受聘去安徽大学哲学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任吉悌、金德隆教授的约请,于1982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1984年又出版了第2卷。1985年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我又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重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进行的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哲学革命。

## 二、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历史解读法”

问:您刚刚提到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这本书在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确实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经验,其中,您第一次发表了与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不同见解。应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进展,它提供了一种解读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新模式、新方法,后来有学者称它为“深层历史解读法”,您对此是怎样看的?

答:我原则上同意这种提法。我以为历史主义的解读方法应该是读懂马克思文本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因为这个时期的著作孕育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它的哲学前提中脱胎出来并走向成熟的极其复杂而曲折的思想演进过程,在这里,若不深入地钻研文本,分析每一时期、每一阶段不同文本中的问题提法、解决思路、特殊语境以及每一个重要哲学术语的具体内涵,运用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中发现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变化,最终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和任何一种新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前提

的,他既从这些思想前提出发,又批判并改造了这些思想前提。而要扬弃一种思想前提并不像脱去一件旧衣服那样简单,例如对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都不是始而全盘接受,继而完全抛弃,而是既要不断地加以理论批判的审视,又要付诸实际运动的检验,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认证中加以取舍、革新和改造。如果仅仅停留在术语的字面含义上,而看不到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同一个术语(如社会、社会存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那我们将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就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准确把握其中的深刻思想变化和语境差异。有人说,从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隔不过数月,怎能说前者和后者的哲学观点就截然不同了呢?这是一种皮相的、非历史的看法,完全不懂得在《1844年手稿》中起关键作用的“类”概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概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哲学范畴,前者是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旧范畴,后者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对此我已在多处作了充分的论证。

**问:**您在那部书中提出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经历了两次思想转变和存在两条逻辑思路,这确实颇具创意,较之前苏联学者的一次转变论和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的断裂说更具合理性,您能对此谈谈当时的想法吗?

**答:**过去苏联学者总强调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便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变,仅此一次转变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此后的著作便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对此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思考,认为这种说法仅仅依据了列宁的一处提法而忽视了列宁在另一处的提法,在那里,列宁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到1846—1847年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才达到成熟的。更为重要的是,前苏联学者在判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转折时,仅仅以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提法为依据,而不是深入研究和对照马克思的文本,而如果不以文本中透露出来的思想线索为依据,所作出的结论就会是武断的、苍白无力的。事实上,第一次转变虽使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但远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



义的高度。通过这一次转变,马克思基本上过渡到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立场,就如我们在《1844年手稿》中看到的那样。真正实质性的、有决定意义的转变是后来完成的。第一次转变相对要简单和容易得多,因为通往一般唯物主义的道路费尔巴哈已经打通了。我们不应抬高这一次转变,否则就会贬低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伟大意义。只是通过第二次转变,才能够谈得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这个观点当是正确的,但是要理解它并不容易。把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到社会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中介环节?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界,在自然界里完全是盲目的力量起作用,而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则是追求自己的现实利益和理想目的的人。以往的哲学都是把推动人们行动的动机、理想、目的作为揭示社会历史奥秘的切入口和出发点,因此走不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怪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但是,如果不从意识开始那应当从什么开始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思考,到1845年春,他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以实践为出发点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诞生。以实践为起点的新哲学不再是道德哲学,而是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谈道,很多人不能接受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费尔巴哈也是这样,他宣称在自然观上他可以同唯物主义者一起走,在历史观上他就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接受了唯物主义就等于宣布理想、道德和宗教这些精神力量不再起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想、道德等精神力量决不当被忽视,甚至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也决不等于零。问题在于理想、道德与现实的关系在旧哲学中是颠倒了的,必须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倒置过来。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的另一个著名论断:“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这就是说,共产主

义的工人运动若不是作为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发展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涌现出来,就不可能有科学共产主义理想的产生。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理想和现实、应有与现有的对立统一,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加以解决的。而不解决诸如此类的历史难题,就不能成功地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在《1844年手稿》中,上述这类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当然没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只能根据现实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来展示自己的理想空间,并为理想的实现获得必要的物质手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道,任务只能在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或趋于成熟的时候才能提出来。人们不应凭空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因为这样,过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不是空想的,它们的哲学基础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

很多人对于发生在1844—1845年之间的马克思思想的重大转变认识不足。《神圣家族》开始显示出这次转变的明显倾向——从抽象理念转向现实社会,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神圣家族》中涉及费尔巴哈的那部分论述比较一下,就能看出,马克思对他的态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应该说,1844年秋至1845年春马克思的思想正孕育着一次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通过什么逻辑环节完成的?这从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手稿可以捕捉到重要的思想信息。在我看来,马克思是通过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批判思考完成了他思想转变上的最后一个环节的。李斯特在那部书中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不同于英法资产阶级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而是为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生产,他闭口不谈德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经济理论的辩护性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重要的思想启示,这就是把生产力从资产阶级的工业制度中抽象出来,作为在历史进程中起基础作用的物质力量。这就为他后来制定科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奠定了理论逻辑基础。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生产关系”这个范畴,他使用的是“工业”或者“工业制度”这种内容并不明晰的概念,而一旦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单独抽象出来,就为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制定了最重要的概念

工具。马克思把生产看作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历史进步的客观尺度,为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理论基石。

**问:**您在阐述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时,同时提出在《1844年手稿》中有两条逻辑思路并存的问题,这个看法是怎样形成的呢?

**答:**我不同意阿尔都塞所主张的“认识论断裂”一说,而是认为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既有渐变也有突变。例如生产实践观点的形成就是始于《1844年手稿》中的“对象化劳动”,终于“费尔巴哈论纲”中的“感性物质活动”。而最早把对生产力的考量与对生产关系的考量区别开来的,也是《1844年手稿》,在那里,马克思把“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作了区分。他批判并要求扬弃异化劳动(雇佣劳动),而肯定对象化劳动即生产性劳动。他认为,从对象化劳动的角度看工业,工业就是被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卷,尽管迄今为止工业发展都是在异化的形式下实现的,但它们仍不失为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因此,人的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工业的发展。这里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思维逻辑,而是现实的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只是这后一种逻辑在《1844年手稿》中不居于主导地位,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辨的本质主义的逻辑。顺便还要说一句,出现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逻辑区分,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后来把生产力从生产方式中抽象出来,制定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而且为对抗历史唯心主义在批判理论的名义下修正马克思主义起了关键作用。例如,上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把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混为一谈,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承袭了这个思想。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有了更明确的说法。他指出,物化和异化不同,物化有两种:一种是劳动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这是指劳动的对象化,即一种特殊种类的具体劳动创造出一定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劳动在其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这是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劳动一般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创造出来的交换价值。所谓异化劳动是在后一种场合下发生的。因此扬弃

异化决不是一般地扬弃物化,而是扬弃导致异化的那种物化,严格地说,是指物化了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物化的生产力。现今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判理论,其矛头所指恰恰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

在《1844年手稿》中,两条逻辑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对这部手稿的定性分析。我认为,《1844年手稿》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远不是一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这部著作主要还是在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写成的。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所阐述的人道主义是被当作世界观来看待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可见马克思当时的历史观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历史观,而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原则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架构。

### 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与方法

**问:**您刚刚谈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这种研究方法的直接成果来看,它确实厘清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从总体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也注意到,在近年的公开论著中,您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不是其体系架构而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您这种强调是否有所特指?或者说您是否一般地反对体系?

**答:**我强调方法并非为了反对体系,而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在过去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们一般是习惯于从体系架构上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路并非完全不对,但是总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从体系的要求来拼接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一些哲学论断,就大大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和科学性。由于哲学体系是一个内容安排问题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特征的深入揭示,因此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到今天的不同体系“模式”,并没有一个能够为大多数人认同的体系,

也就是说体系是敞开的。我们究竟依靠什么来构筑体系？方法始终是核心，是体系的“活的灵魂”。

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历程看，我们很容易发现马克思的理论宗旨并非要创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而是旨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史上伟大革命的成果，它本身就是通过冲破旧体系哲学来实现的。我们前面谈到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两次转变和《1844年手稿》中的两条逻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就给体系的建立带来一个问题，如何把马克思思想探索过程中的深层哲学思想反映到体系中来？而如果考虑到这个过程细节，问题将更为复杂。例如，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改造而言，他至少经历了五次重要的批判，每次获得的理论成果都是不一样的，如何从这种思想变化中把握他的方法论特质就是一个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抛弃模式化的体系哲学的思维，认认真真地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通过扎实的历史分析达到“返本开新”的目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出发，我们更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方法论特征。按照我们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延伸。事实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运用辩证的而不是直观的唯物主义揭开人类历史的奥秘和社会生活本质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在改造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问题上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可见，他们对于作为哲学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是在历史领域中开始，而在政治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臻于成熟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全面透视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光辉典范，因此《资本论》的方法（大写的逻辑）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遍性，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公式乱套。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复强调过。由此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就不是用一套术语、概念和范畴重新建构出一种新体系，而是坚持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深入探索理论和现实的重大课题。

**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方法而不是体系确实能够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它也关涉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

这个重大问题。请问,从方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是什么呢?

**答:**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这本书中,我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原理、公式和结论的总和,它所以和一切反科学的教条主义体系格格不入,就在于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都应该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不是把方法看成是独立于事物本身的“纯粹”的逻辑学,而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观点与这种方法的特征是一致的,因为从实践立场看,并不存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理性工具”和“概念体系”。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看,他们都强调辩证法,在逻辑学与认识论一致性问题上是共同的。但是,把辩证法本身视为“绝对精神”展开的法则,这就把辩证法神秘化了,这一点马克思是不能同意的,因此,在马克思方法成熟的过程中,批判黑格尔是必然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科学和全面的表达——《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商品出发分析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分析的科学起点,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正是后一条件的支持,《资本论》才得以可能成为科学。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黑格尔的逻辑学提出科学问题,但他本人却没有能够走向科学。在今天,我们面临着比马克思更为复杂的历史环境,在分析这个环境时不坚持唯物辩证法根本不行,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因。

**问:**在一般的讨论中,我们也经常强调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提法与唯物辩证法有什么关系呢?

**答:**毫无疑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对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的概括。我们都知道列宁一句著名的评论,他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最根本的仍然是唯物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之一,而是它的根本方法。关于这一点,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中有着详细的论述。需要强调的是,正是从“三个同一”看,这

一方法完整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不仅体现了历史主义和发展原则,也体现了理论研究中研究方法 with 叙述方法的统一。从这一方法特点看,马克思的辩证法处处都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并随时都受现实生活检验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方法。

**问:**请问从方法的角度如何看待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和特征?

**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面临一个发展问题,今天我们强调“与时俱进”就是一个发展问题。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革命的方法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作出的具体结论上,这些结论随着历史环境的推移有的已经不再有效。很显然,从这些结论出发会在理论上产生误区,在实践上产生危害。因此,我认为,仅仅围绕体系争论并不能真正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体系而在方法。如果抛弃或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那末,任何哲学体系,即使仍然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称,也不能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 四、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问:**从上面的谈话看,您似乎已经从原则上表达了您对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您的著述中直接读出来。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吗?

**答:**是的,基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理解,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马克思在1845年就加以批判地扬弃了,这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无疑的印证,无论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还是他对赫斯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都是针对其抽象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而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对“文革”时期的错误指导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的过程中,国内理论界刮起了一股“人道主义”的旋风,不仅完全

否定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力图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立场:用抽象人本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我认为,这种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主张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它会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和严重的政治后果。为此,我在1981年发表了《坚持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一文,意在强调清理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断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立场。此后不久,国内思想界由于自由化倾向的不断加剧,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混乱局面,几度反复之后,终于酿成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切都证明了,不加区分地鼓吹抽象人本主义的哲学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极端错误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非道德主义,更不否定作为一般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否定作为历史观基础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是因为这种以人的抽象本质为出发点的历史观,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因而在哲学上是没有根据的、站不住脚的。而作为伦理规范的人道主义,当它被赋予一般的抽象含义时,历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当资产阶级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堂而皇之地对无产阶级进行疯狂镇压的时候,马克思曾尖锐地加以抨击和讽刺,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因此就笼统地否定人道主义的历史作用、道德内容和人文价值。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多处使用过“真正的人道主义”、“现实人道主义”、“实践人道主义”这些不同的提法,意在说明,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的人道主义是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在内的真实而非虚幻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真正的实际的步骤。

**问:**谈到人道主义就要联系到异化,马克思在其早期和后期著作中都使用过“异化”概念,您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哲学内涵吗?

**答:**是的,我认为它们有着不同性质的内涵,因为它们所依据的历史观基础是根本不同的。早期的“异化”范畴,例如《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属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基础上的重要范畴,其出发点和参照物是抽象化的人的“类本质”。和异化劳动相对照的是非异化劳动,它



是人的“类本质”的能动体现,是它的现实化和对象化。异化劳动则使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成为抽象的人。因此,必须扬弃异化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得以复归。而在后期(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用“异化”范畴,其内容是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人相异化,比如,商品的交换价值、货币、资本以至整个私有财产制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都是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和人相异化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引述马克思的话说明过了。

异化问题至今仍是中西方哲学争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总起来说我有三点看法:第一,在马克思著作中,对异化问题的表述也有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马克思是用异化来说明历史,其立场是人本主义的异化历史观。在后期,马克思转向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力图通过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起源史的研究,来说明异化的历史缘起。这样,他就能用作为科学认识结果的异化起源史取代作为思辨结构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把异化看作是伴随商品交换和私有制一同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现象,其实质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和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相异化。第二,不应把异化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标尺。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标志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阐述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这个客观尺度。从这个尺度上来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与趋势,就不会为纷繁复杂的主观道德诉求、价值主张、文学艺术倾向以至哲学思潮所迷惑,陷于无休止的烦琐争论和空谈,而拿不出任何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和步骤。第三,不应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笼统地用来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而又较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对于这些矛盾和困难不应当用异化的观点来加以批判和指责,而应该用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办法来克服与解决。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异化是一种反思的规定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异化就是“非人道”,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和困难说成为异化,是对价值的误判,也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